

陸宗達、王寧先生辭書學理論述略*

王鴻濱 李亞明**

陸宗達先生(1905-1988)和王寧先生(1936-)是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重要繼承人，也是傳統語言文字學向現代語言學轉型時期繼往開來的語言學家和辭書學家。我們試從以下幾個方面對陸王辭書學理論特別是單語詞典編纂理論作一綜述。

一、倡導辭書的教育作用

在人類文化歷史長河中，辭書起到了渡津和舟楫的作用。陸宗達先生和王寧先生深刻認識到辭書及辭書編纂對於積累和傳播文化與科技知識的重要性：「辭書是貯存詞語或以貯存詞語的形式來貯存知識的一種特殊書籍。」〔1〕「辭書是貯存字、詞、音、義的倉庫。」〔2〕「辭書編纂是關係到整個民族學習和生產的大事，也是關係到保存和發展文化科學技術成果的大事。」〔3〕〔P566〕「辭書的編纂是關係到文化積累與知識傳播的大事。」〔4〕〔P278〕「任何時代都要編纂為自己的時代所需要的語言工具書。有了工具書，才有利於文獻古籍和科學文化的普及。」〔5〕〔P190〕為此，陸王二位先生積極宣導辭書的教育作用，並根據引導功能，將其表現總結為三個方面：

一是語言教育的作用。早在20世紀上半葉，被譽為「我國現代字典編纂理論的啟蒙者」的黃季剛(侃)先生就預見：「蓋文字者，學術文辭之所依，方今學術闡明，文辭革進，誠使文字之業廢而不修，恐訛謬滋繁，關係者巨。然則字書之編制，誠有不可緩之勢矣。」〔6〕〔P14〕他的預見是基於辭書的語言教育的作用，即「引導讀者在表達思想時使用規範的、為全社會普遍接受的、最有利於傳意的詞語去說話、作文。」二是知識教育的作用，即辭書「幫助讀者選擇知識、過濾信息」。三是思想品德教育的作用。〔7〕

* 本文撰寫承蒙王寧先生慨允，引用其著述，謹致謝忱！

** 王鴻濱，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博士後；李亞明，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編輯部主任、主任編輯、博士。

此外，辭書的教育作用還表現為辭書在工具性與人文性統一的教學中的作用。王寧先生指出：「好的辭書不只是把語言材料任意排列，堆砌擁塞，而是利用自己的體例，給出詞語的意義特徵，暗含詞語的意義關係和意義系統。好的辭書有很多使用的功能，是一般人難以覺察的。在語文課改向工具性與人文性統一的方向進展的過程中，教學不提倡脫離語言的空泛『感悟』，而對母語教學來說，不論是閱讀還是寫作，應當以詞彙教學為中心。辭書對語文教學使用的主要功能在詞彙教學，所以，深入發掘辭書在這方面的功能，對教學品質的提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激發學生使用辭書的興趣，培養學生探討語言現象的敏銳性，是語文教學課改中的一項很好的經驗。」利用辭書展開語文教學課改，這是由辭書的教育作用所決定的。

二、汲取傳統語言文字學和當代相關學科的營養，推陳出新

傳統，一般是指由歷史沿傳而來的思想、道德、風俗、藝術、制度等因素的總和。它的內容既包括人們對各種事物的信仰、關於人和事件的形象，也包括人類社會的慣例和制度，甚至也包括物質實體。它們都是人類代代相傳的思想和行為的產物。傳統具有延續性、集體性、優勢合法性、潛意識性、群屬認同性、實用方便性和可塑性等基本特性。王寧先生概括：「甚麼是傳統？傳統是具有歷史和傳承性、民族性和國度性的不滅的精神，傳統必定是本土的東西。」[8]

中國辭書學特別是單語詞典編纂理論，面對的是浩瀚的傳統語言文字學海洋。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是中國辭書學特別是單語詞典編纂理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營養源泉。

以訓詁學為例。陸宗達先生指出：「對工具書的編纂和修訂，離開訓詁學，是無法進行的。……工具書的體例，總要參照前人訓詁專書和注釋書。……今天編纂字典辭書時釋詞的方法，仍未越出前人的範圍。」[5][P190-191]「用今天的語言來概括地說明詞義，還必須吸取前人訓詁的經驗。」[5][P196] 例如，互訓、推原和義界「這三種訓詁方式，在編纂語言工具書時仍然是離不了的。實際上，目前所有的字典、辭典在解釋字、詞時仍然必須用互訓或義界的方法，或者二者兼用之。用今天的語言來概括地說明詞義，還必須吸取前人訓詁的經驗。」[5][P190-191] 反之，「不通訓詁，對一些詞語的解釋，不可能確切，常會望文生義而降低工具書的科學性和使用價值。」[5][P198] 王寧先生也指出：「古代的訓詁纂集經常是現代辭書取材的來源；而且，它們給現代辭書提供的經驗方法是非常寶貴的，研究辭書學的人不可不對訓詁纂集給予特殊的關注。」[4][P65]

辭書學在汲取傳統語言文字學營養的同時，也應汲取當代相關學科的營養，推陳出新。被譽為「現代詞典學的啟蒙者與奠基人」的章太炎先生「開始突破以經籍為物件，以文

字為中心的傳統字書訓詁框架的束縛，而代之以形體為對照，以語音為先導，以詞義為中心的嶄新的詞典訓釋綱領，從而推動漢語詞典編纂日趨科學化、現代化。」[9][P436-437]堪為典範。陸王二位先生指出：「編好辭書本身是一門專門的科學，同時，還要借助於詞彙學、語義學、文字學、社會學以及各種科學技術的研究成果。」[3][P566-567]「辭書編纂特別是語文詞典的編纂需要語言學理論的指導。」[4][P279]「想要編一部好的辭書，必須在科學的語言文字學指導下進行。」[4][P68]「訓詁學、辭書學和詞彙語義學的相互吸收和相互溝通，既是基礎理論對應用的指導，又是應用科學對基礎理論的檢驗；這是本世紀應當努力追尋的目標。」無論是古為今用還是洋為中用，都不應盲目全盤照搬，中國辭書學的立足點仍應在中國。

事實證明，陸王二位先生關於辭書學汲取傳統語言文字學和當代相關學科營養的理念是正確而有效的。例如，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故訓匯纂》之於《經籍纂詁》，除了規模擴大和編排體例重新設計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故訓匯纂》的編例，是在現代語言文字學觀念的指導下創立的。在詞彙學方面，它收錄了大量的複音詞，包括先秦典籍的複音詞，打破了上古漢語極少複音詞的成說。在文字學方面，它嚴格把握異體字，關注了簡繁字對應中的諸多複雜問題，清理了字用學中通假、分化等相關概念。在訓詁語義方面，辨析了形訓、音訓、義訓，分清了假借與同源，注意了本義、引申義和假借義。在音韻學方面，它重視《廣韻》反切與現代音的配合標注，處理又音問題時，不但從語音發展的角度，分析了又音發展的趨勢，而且注意了以音別義的語言事實。」[11]可謂「有造詣的詞典編纂者的真正藝術」。

三、緊扣辭書特點，注重辭書編纂的概括性和系統性

辭書作為一種特殊的圖書，具有自身多種多樣的特點；辭書編纂也相應地需要符合各項要求。本處略述陸王二位先生關於辭書的概括性和系統性的思想。

1. 概括性

概括性是對辭書的要求之一。專科辭典和百科全書的概括性指濃縮、提煉條目的基本知識，而語文詞典的概括性則是由詞義的概括性決定的。陸王二位先生指出：「詞義具有概括性與具體性統一、共通性與民族性統一的特點。」[12][P104]「一個詞的概括意義，是全民族共同的抽象思維的結果，它概括了同一民族的人對同一事物的共同認識……概括詞義與具體詞義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是統一在同一詞形之中的。」[12][P105]因此，單語詞典編纂在吸收訓詁成果時，必須明確區分詞義訓釋和文意訓釋這兩種不同的訓釋，並注重詞義訓釋。

黃季剛(侃)先生曾說：「蓋小學家之說字，往往將一切義包括無遺，而經學家之解

文，則只能取字義之一部分。……小學之訓詁貴圓，而經學之訓詁貴專。」〔6〕〔P192〕按照王寧先生的詮釋，詞義訓釋（也稱語義注釋）「指的是表述或顯示文言文詞的概括義和句子的句面義的注釋。因此，它往往是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的嚴格對應。」〔4〕〔P249〕單語詞典所應吸收的訓詁成果，當是詞義訓釋。相反，與詞義訓釋相對的文意訓釋則不適於單語詞典吸收。這是因為，「語言環境對詞語的使用意義是有限定作用的。」〔4〕〔P18〕「隨文釋義是對存在於語言環境中的言語意義加以解釋的工作。言語是語義存在的實際載體，語境中的詞義特點是：單一性、具體性、經驗性。這種訓釋有兩種形式是不能搬到詞典中去的：第一種是顯現言語具體性和經驗性的文意注釋。……依賴語境的文意訓釋是個性化的，也就常常是唯一的，不能將它們普遍使用，自然也就不適合直接搬到辭書裏去。文意注釋轉化為詞義（語義）注釋的關鍵是要把依附於具體環境的經驗性內容——也就是在概括詞義之外的個性化內容抽象出去。」〔10〕辭書如果誤將文意訓釋當成詞義訓釋，就會影響自身的準確性，甚至影響某一部「辭書」是否成其為辭書的本質特徵。王甯先生指出：「古代的很多訓詁專書如《爾雅》，在集中同訓詞時往往將文意訓釋混入，便出現很多同訓而非同義的現象；又如阮元的《經籍纂詁》，是將古代文獻已有的成訓全部編入，詞義訓釋與文意訓釋不加分辨。所以，嚴格說來，它們都不是科學意義上的詞典，只是一種訓釋材料的類編或音編。」〔4〕〔P94〕「將以溝通為目的的文意訓釋誤作詞義訓釋來分析詞義，在理論上也極易發生錯誤。」〔4〕〔P94-95〕這是因為，「詞是詞彙的個體，它通常以兩種狀態存在：一是貯存狀態，一是使用狀態。貯存狀態的詞是作為全民語言的建築材料而存在的，一般情況下，這種狀態的詞是從大量使用狀態的詞中歸納出來的，因而它的有形存在是人們編纂的詞典。……貯存狀態的詞，意義大都是多項的，每項意義又是經過概括的，因而必然含有廣義，義值也是籠統的。」〔4〕〔P89-90〕所以，「在編纂辭書選用古代文獻已有的訓釋材料時，分別貯存與溝通這兩個目的，弄清詞義訓釋（概括義訓釋）和文意訓釋（具體義訓釋）這兩種性質，是非常重要的。嚴格地說，只有ⅠA（多項的，概括而有廣義的詞義〔概括義〕訓釋——今按）與ⅡA（確定義項〔唯一義項〕的詞義〔概括義〕訓釋——今按）這兩種訓釋可以直接選入辭書，ⅡB（明確指向〔指向單一〕的文意〔具體義〕訓釋——今按）與ⅡC（陳述義值〔非多義、非廣義〕的文意〔具體義〕訓釋——今按）是必須經過再度概括才能寫作義項的。」〔4〕〔P94〕「隨文釋義中，還有一種訓釋方式是不適用於單語辭書的，那就是單訓的形式。……字典辭書從實際的言語中概括出語言意義時，就把詞義從使用狀態轉變為儲存狀態。這時的詞是作為全民語言的建築材料而存在的，在它的意義中，保存了使用該語言的人們對這個詞所標識的事物全部的共同認識和感情色彩，包括了全民族統一的對於用這個詞命名的事物的各種經驗，這時的詞義，發生了三方面的變化：首先，它沒有了語言環境的限制，解除了句義帶來的規定性，因而只能是多義的。這就存在一個為它劃分義項的問題。第二，它失去了語言環

境為之提供的具體內涵，不再有說話者個人希望展示的具體的情感和形象的體驗，因而必然丟失了那些經驗性的內涵，具有了概括性。第三，隨著經驗性的個性化內涵的消失，它失去了具體的所指，產生了詞的廣義性。這時的詞義訓釋標準的方式是義界。」〔10〕由此可見，辭書的釋義具有概括性，與具體言語環境中的詞義並不完全相同。

溯流而上，章太炎先生的詞典理論「看重義項概括，主張從實(事物實體)、德(事物特徵)、業(事物功能)幾個方面詮釋語詞義與名物義，並首次從理論上提出『界說』(黃侃易作『義界』)科學概念，又特別注意對詞的義界的劃分與確定。」〔9〕〔P441-442〕黃季剛(侃)先生則正式提出「義界」的概念：「謂此字別於他字之寬狹通別也。」〔6〕〔P187〕王寧先生2004年3月6日講授《訓詁學》課時述：「義界能準確地抓住語義特徵。義界的『義值差+主訓詞』方式能找出與所有定義相區分的唯一的獨有的特徵。」2005年4月20日講授《詞彙語義學》課時述：「只有使用義值差，才能以語言解釋語言，求其同別其異。同與異的有序化，就形成系統。」「義值差是獨一無二的特徵。經過一分為二的逐層分析，最後的格位置就是義值差。義值差與主訓詞的義場的獨特性的原則，決定了其唯一性。」關於義值差所表現的詞義特徵(點)，陸王二位先生指出：「把握詞義的特點，是認識詞義時以簡馭繁、提綱挈領的方法。」〔3〕〔P458〕「從意義關係看，詞與詞可有兩大類關係：第一類是相承關係，也就是兩個詞在同一引申系列中的不同位置上。……第二類是相重關係，也就是兩個詞不在同一引申系列中，但它們卻有數量不同的相同或相近的義項。」〔12〕〔P124-125〕後者有三種具體情況：一是多義詞的某義項相同，即在兩個詞的引申系列中，只有「點」的重合；二是多義詞的某幾個相鄰的義項相同，即在兩個詞的引申系列中，不僅有「點」的重合，還有「段」的重合；三是多義詞的各個義項一一相應或引申系列的趨向一致，即不僅是「點」與「段」的偶合，而且是「線」的一致。〔12〕〔P125-129〕陸王辭書學理論區分詞義訓釋與文意注釋，對於單語詞典編纂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2. 系統性

系統是由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要素(部分)組成的具有一定結構和功能的有機整體。系統性也是對辭書的要求之一。廣義的系統性是指辭書內容相對完整，結構嚴密，各組成部分關係適當，協調、平衡；狹義的系統性則特指釋義體現詞義的系統性。

王寧先生認為：「詞語的系統性是知識系統性的反映，體現系統性的重要標誌是類別和層次。有了分類和層次，不但可以檢查詞語的搜集是否全面，而且可以確定每一個詞語在系統中的位置及其與其他詞語的關係，從而確定如何對它的內涵加以表述。」〔4〕〔P268〕辭書「以單個的詞語解釋為基礎工作，達到從總體上彙集、整理、存貯、展示人類某一範圍內知識全貌的目的。」〔1〕因此，「就辭書的總體看，釋義的方法是有系統的，這是因為辭彙與詞義在客觀上是成系統的、具有內在聯繫的。」〔7〕由此看來，單語詞典

釋義的系統性是由詞義的系統性決定的，具體表現為詞義的整體性、關聯性、層次性、有序性和立體性等。

詞義的系統性還表現為詞義的相互作用和影響。陸宗達先生指出：「詞義不僅相互聯繫，而且相互作用，詞義的相互聯繫與相互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分析詞義的相互作用需要憑藉詞義相互聯繫的線索與條件，而認識詞義的相互作用又有助於加深理解詞義相互聯繫的方式及詞義的發展與源流關係。」〔3〕〔P460〕鄒鄭評價，陸宗達先生「運用現代科學的觀點與方法，對作為詞義運動基本形式的詞義引申問題，作了系統的理論闡述。這不僅進一步發明了章黃語言訓詁學說，同時也給詞典編纂剖析詞義現象提供了科學的方法。」〔9〕〔P534〕陸宗達先生的詞義引申理論「有力地啟示我們，要更新觀念，探索與運用漢語詞義引申的一般規律，把語詞詞典編纂的重心由縱、直、線的單行道，逐步轉移到縱橫交錯、直旁配合、線扇統一的立體通道上來。」〔9〕〔P541〕這種「立體通道」，實即系統性。

不唯釋義如此，辭書從主體設計到框架設計（分類編排、詞目纂集），從編則、纂例、凡例、語料整理到附錄，都應體現系統性。

四、注重辭書編纂各個環節，提高辭書質量

辭書學理論源於辭書編纂實踐，而又回到實踐中去指導實踐，實現第二次飛躍。正如王寧先生所指出的那樣：「辭書學需要有自己的、以編纂技術為中心的、獨立的學科系統，它和一切應用科學一樣，不能只以原理的科學化為滿足，更要把科學原理轉化為操作技術，以追求最完美的社會效應。」〔4〕〔P267〕完美需要各個環節品質的保證。

1. 主體設計

辭書編纂主體設計是辭書編纂工作的指導思想，包括對特定辭書的性質、讀者物件、規模、編排方式等內容的總體設計。在中國現代辭書史上，黃季剛（侃）先生曾從選形、載音、收字、部首檢字四個方面考慮字典的編制細則，就屬於主體設計。〔9〕〔P450-451〕王寧先生指出：「評價一部辭書的好壞，不能只看它收詞量有多少，更重要的是看它的主體設計，即運用何種原理擇定、歸納詞語並將其系統化，並要看這種主體設計用何種方法實現以及實現的技術水準。」〔4〕〔P268〕因此，「好辭書貴在主體設計的科學性。」〔4〕〔P269〕「自覺的理論認識貫徹到辭書的主體設計裏，必然使辭書的整理更加成熟，同時也一定會提高它的實用性。」〔4〕〔P269〕「一部具有科學理論指導下的主體設計的辭書，增補將使它豐富完善；而一部缺乏自覺整理意識、主體設計粗疏甚至混亂的辭書，增補也許會使它更為蕪雜。」〔4〕〔P273〕「辭書編纂中更高一級的創造性勞動，是確立主體設計和體現主體設計。……個別詞條與釋義，應是辭書主體設計的一種微觀體

現。」〔13〕由此可見，辭書編纂主體設計是辭書編纂總體設計的出發點、基本依據和歸宿，對保障辭書品質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辭書的編則、纂例、凡例及附錄，都要體現辭書編纂主體設計的理念。

2. 框架設計

框架設計是辭書編纂的基礎，主要包括分類和選詞兩個方面。

分類即歸類，是把具有共同特點的個體物件歸入同類並把具有共同特點的類概括成更大的類的方法，是形成概念的先決條件之一，同時也是辭書框架設計的先決條件之一。王寧先生指出：「無論辭書用何種方式編排，都應當先按嚴格的分類來立條目、擬條文，也就是要先進行嚴肅的整理，再來考慮編排技術。」〔4〕〔P269〕「在辭書的一切編排形式中，最難藏拙的是分類編排。……分類編排使編者心目中的分類層次全部曝光，一有差錯，比如出現類別外延交叉、層次混亂、種類不全等現象，立即顯現。」〔4〕〔P269〕分類的理念不但貫穿在框架設計中，而且也在釋義中體現出來，釋義「用語與內涵都要體現分類與層次」。〔4〕〔P269〕

框架設計還有選詞的任務。選詞是根據特定辭書的性質、宗旨、規模和讀者物件等因素而收集、選定詞目的活動。詞目在框架的範圍內選定。王寧先生指出：「冠以『詞典』就必須把『詞』編好——不能缺，缺了查閱功能降低，不是好詞典；也不能冒，冒了擾亂辭彙系統，雜糅混淆，做些廢功不算，也要降低功能，使詞和片語難辨。」〔14〕這就是說，辭書特別是單語詞典的選詞既要滿足讀者的查檢需要，體現辭書的檢索性特點，也要尊重語言的現狀和發展趨勢，特別要根據現代漢語辭彙穩定的條件，冷靜地看待並處理新詞新語：「辭書要收的詞語必須是已經進入社會或已經看清了進入社會的趨勢、有了固定書寫形式的可用詞語。」〔13〕選詞規範而合理，保障內容完整、系統和均衡，避免重大遺漏和重複，經得起較長時間的穩定性考驗，是辭書品質保障體系中期保障機制的重要內容。

3. 釋義

釋義即解釋和說明，是辭書的核心內容。王寧先生指出：「如何把訓釋作得簡潔而準確，直接涉及到辭書編纂……的品質。」〔4〕〔P88〕釋義的品質也是辭書品質保障體系中期保障機制的重要內容。

辭書釋義不能僅僅停留在原始語料階段。語料好比礦藏，要經過冶煉才能成為辭書的釋義。

怎樣冶煉呢？陸王二位先生提出，不論運用哪種辭典、辭書，都不能僅僅一查了事，要想精深而準確地瞭解詞義，都要做「查」、「聯」、「辨」、「分」這四種工作。〔12〕〔P139-159〕「查」即查本求源，指用多義詞的本義來貫通引申義，用同源詞的根詞來貫通

派生詞。「聯」即係詞聯義，包括有源有本的系聯（根詞和本義已經明確後的系聯）和本源未定的系聯（根詞和本義未確定的系聯），目的是為了瞭解詞義變化的線索，有系統地探求詞義的全貌。「辨」即較同辨異，包括同義詞的比較、古今詞義的比較、古代書面語與口語的比較。「分」即尋形分字，包括歸納變易字（指形體不同，聲音小變，記錄同一個詞的字）、統一字書與經典的不同字形、析別假借字等。

陸王二位先生還提出了做以上四種釋義工作的三種方法，即「以形索義」、「因聲求義」、「比較互證」，三者之間互相依存，互為作用。二位先生的釋義理論價值具體表現為：

1. 確立了根據原始字形而求本義的原則與條件（「第一、本義必須與字形相貼切，由此證明造這個字時，是根據這一意義來構形的。第二、本義必須是在實際語言中確曾使用過的意義之一，因此，探求本義必須參證於文獻語言。第三、本義所反映的現實事物或這個民族共同的經驗和認識，必須早於其他詞義所反映的內容」〔12〕〔P188-192〕）；

2. 肯定了因聲求義方法的作用〔3〕〔P249〕；

3. 結合形、音，把握詞義內在規律（「在運用『以形索義』和『因聲求義』方法的時候，絕不能脫離詞義本身的內在規律——包括詞義的特點、存在的形式、運動的規律以及詞義之間的相互關係。」〔12〕〔P103〕「運用詞義本身的內在規律，通過詞與詞之間意義的關係和多義詞諸義項的關係對比，較其異，證其同，達到探求和判定詞義的目的。比較互證可以解決同義詞的辨析、疑難詞義的驗證、同根詞（同源字）的判定等問題。」〔4〕〔P130-133〕）。陸王二位先生的訓詁方法論在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對辭書釋義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4. 修訂增補

世界萬物新陳代謝，注定辭書具有生命週期。修訂增補是保持辭書生命力的手段。例如，黃季剛（侃）先生早在20世紀上半葉就曾設想：「清世阮元有《經籍纂詁》，為小學家常用之書。惜其以《佩文》韻分編，又載字先後毫無意義，至其蒐輯亦有不備者。今若能通校一過暫用字典編制法編之，次為補其遺闕，此業若成，則材料幾于全備矣。」〔6〕〔P14〕時隔大半個世紀後，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故訓匯纂》「實現了黃季剛先生重編《經籍纂詁》的理想」。〔11〕辭書的修訂增補，無論是新版修訂（再版）還是重印修訂或補卷修訂，都會不同程度地為辭書注入活力。

王寧先生倡議：「語言與科學都在發展，即使是一部好詞典，也應過一個時期就修訂增補一次。」〔4〕〔P273〕「已經由國家立項並編纂出版的大型辭書，或由權威的專家編審並已為讀者接受的好辭書，如《辭源》、新《辭海》、《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中

國大百科全書》、《現代漢語詞典》……等等，每過一個時期，應組織人力重新修訂，一方面吸收新的研究成果，補充新知識與新詞語，另一方面採納專家與讀者的合理意見，修正錯誤，使其逐漸完善，具有長期的權威性。把功夫花在這些已有基礎的辭書的修訂上，比之建立重複選題再從頭作起，實在是事半功倍。這樣作，也可防止抄襲，杜絕浪費。也只有這樣作，若干年後，我們才會有幾部可以代表中國文化素質、深得讀者信任、富有特色、可以向全世界推出的著名辭書。」〔1〕王寧先生的倡議，已經得到有關各方回應。

五、倡立辭書著作權標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辭書事業有了飛速的發展，但是辭書著作權糾紛也屢見不鮮。究其原因，一是相關法規不夠健全，二是存在認識上的誤區甚至謬論。王寧先生出於社會責任感和正義感，深切關注辭書著作權問題。對於相關法規不夠健全的問題，他疾呼：「辭書是一種特殊的書籍。對辭書抄襲問題的認定和處理，必須在《著作權法》之中或之外補充制訂可操作的細則。」〔1〕對於辭書學理認識上的誤區甚至謬論，她辨明：「從訓釋理論看，詞的意義是客觀的，但對詞的訓釋卻是主觀的。詞義一經社會約定，在一定的時間內，具有不可更改的絕對性；而對於詞的解釋，卻是訓釋者在自身認識和表述能力的基礎上，對詞義的主觀描述，因而是相對的。由於這種描述是一種主觀把握，而且要以儘量準確地反映客觀詞義為一種追求，所以，它是一種創造性的智力勞動，是一種個人的成果，不是社會共有的。把詞義訓釋說成是『社會共同財富』，正是犯了把客觀的詞義和主觀的訓釋混為一談的理論錯誤。」〔13〕不唯釋義具有著作權，辭書的主體設計也有著作權：「已經體現在辭書中的編纂體例，是一部辭書更為主要的成就所在，是構成辭書著作權的更為重要的因素。」〔13〕偽劣辭書由於沒有原創性，因而在著作權問題之外，還存在種種品質問題：「不好的辭書常常因為刻意回避原創辭書的原創點而不負責任的肆意修改而抄錯、改錯。」〔2〕因此，確立辭書著作權標準，不但是保護知識產權大勢所趨，也是保障辭書事業健康有序發展的需要。

通過上述梳理，我們可以看到，陸宗達先生和王寧先生的辭書學理論對於辭書編纂方法和手段的繼承發展，以及新時期辭書學理論研究，都具有重大價值。

參考文獻

- 〔1〕 王寧 辭書品質縱橫談〔J〕，上海：辭書研究，1994，（5）。
- 〔2〕 王寧 中學語文教學課程改革和辭書使用功能的開掘〔R〕，報告綱要。
- 〔3〕 陸宗達 陸宗達語言學論文集〔C〕，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 [4] 王寧 訓詁學原理[M]，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
- [5] 陸宗達 訓詁簡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 [6] 黃侃述、黃焯 文字聲韻訓詁筆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7] 王寧 論辭書的教育作用[J]，上海：辭書研究，2003(1)。
- [8] 王寧 中國傳統語言學的繼承和發展[R]，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高級研討班，2004。
- [9] 鄒鄆 辭書學探索[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 [10] 王寧 單語詞典釋義的性質與訓詁釋義方式的繼承[J]，北京：中國語文，2002(4)。
- [11] 王寧 〈故訓匯纂〉序[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 [12] 陸宗達、王寧 訓詁與訓詁學[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 [13] 王寧 簡論辭書的創造性及其著作權——駁「共識」論與「共同精神財富」論[J]，上海：辭書研究，1997(3)。
- [14] 王寧 談〈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的詞目纂集[J]，北京：語言文字應用，1997(2)。

【本文屬專著類】